

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 的安全视角分析* (下)

——非传统安全因素

谢立忱 黄民兴

内容提要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看,中东领土边界争端与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恐怖主义等因素休戚相关。中东重要的石油和水资源的来源地或储藏地通常位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或近海经济区内,从而导致中东地区的资源冲突和经济要道争夺往往与边界领土争端相互交织。恐怖主义不仅激化了中东国家间的仇恨,造成边界领土争端进一步复杂化与国际化,而且常常阻断边界领土争端和平解决的进程。从安全视角讲,解决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变国家安全观念与确立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

关键词 中东 领土与边界 纠纷 非传统安全

作者简介 谢立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69);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看,中东领土边界争端与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以及恐怖主义等因素息息相关。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主要指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领域的低政治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等。尽管非传统安全是盛行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新安全观”,但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绝大多数早已存在,像当前的恐怖主义、石油短缺、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只是近年来它们的表现形式和造成的危害已具有新的特点,只是现在人们才视之作为一种“新的安全威胁”而予以更多的关注罢了。

资源安全

资源涵盖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这里主要分析前者。自然资源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建筑材料,是日常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人类历史一直就以一长串接连发生的资源战争为特点,这种战争可一直绵延追溯到最早的农业文明时代。当前,自然资源的基础地位与对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愈益受到各国重视。就国家层面来讲,所谓资源安全主要指一个国家因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受到某些因素(如资源枯竭、资源价格变动、军事入侵、生态环境破坏等)干扰而不能获得持续、稳定、及时、足量的供给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威胁或损害的状态。¹ 由于中东石油和水资源的来源地或储藏地是由两个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战后亚洲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中期成果。

¹ 参见蒋满元、魏芳:《国家资源安全及其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理性选择分析》,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第23页。

或更多的国家分享的,或者是位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或近海经济区内,争夺石油资源和短缺水资源的冲突风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便格外令人担忧。任何资源都必然是以一定范围的土地为依托的。因而,中东地区的资源冲突往往与边界领土争端相互交织。另外,素有“世界第一油库”之称的中东是西方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地,为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包括英、美在内的许多大国选择了干预局部争端,从而给中东地区国家边界领土争端增添了外来势力干预的因素。

首先,从石油资源来看,伴随现代社会对石油的依赖加重,石油已成为国家安全基本保障条件之一。对于那些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尤其是西欧、美国和日本来讲,来自中东的石油安全已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在源自中东石油安全的基础上,国家安全才有保证。这并非夸大之谈。众所周知,中东蕴藏着世界上最富饶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战后崛起的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地,是西欧、日本和美国进口原油的重要来源。到1973年,西欧从西亚和北非进口的石油占总进口的82.2%,日本占76.3%,美国占13%以上。¹1999年,美国、西欧和日本从海湾进口的石油占各自石油总进口的比例分别为25.1%、50%和74%。^④鉴于中东石油在美国、西欧、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安全中的重要性,为阻止发生任何可能危及石油供应安全的动荡,许多大国尤其是美国便积极插手中东事务,从而给极易引发地区动荡的边界领土争端增添了外来势力干预的因素。

阿以领土争端便与这种因石油安全引发的外界强权干预密切相关。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阿以战争,其关键性因素就是石油安全。纳赛尔封锁当时承运欧洲2/3的石油的苏伊士运河,无疑切断了英、法等西方国家经济的命脉。英国和法国政府明确表示:他们绝不想中断运河的航运,特别是石油运输。^④于是,英、法便伙同以色列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企图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这次战争尽管未在阿以间造成新的领土争端,却对阿以冲突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第二次阿以战争是阿以冲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色列的举动错过了20世纪50年代有可能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最后一次机会”,此后则关闭了一切接触和谈判的大门。^{1/4}而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烘托下,也排除了一个时期内再同以色列接触和谈判的可能。^{1/2}其二,第二次阿以战争是以色列改善与英、法关系的一个契机。战前,以色列与英、法尤其是英国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战争中以色列得以与英、法结成军事同盟,战后双方关系迅速升温。尤其是法国,成为60年代中期以前以色列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国。^{3/4}得益于大量先进武器的援助,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得到加强,安全观念逐渐发生转变,从而为后来第三次阿以战争(1967年)的爆发和以色列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期埃以成功实现和谈的背后也有深刻的石油因素。阿拉伯产油国在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1973年)中和战后配套使用石油武器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受了空前的石油危机,国家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为尽快结束石油禁运,摆脱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施以较大压力,阿以双方、特别是以色列最终作出了很大的领土让步,从而使作为阿以冲突里程碑性事件的《戴维营协议》得以尘埃落定。埃以和谈将阿以冲突从军事对抗阶段带入了新的政治谈判时期。当然,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积极促成埃以和谈的诸因素中,除了石油安全因素外,还包括其他因素。然而,石油因素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另外,90年代初期伊科领土危机独特解决方式的背后也隐藏着重大的石油安全因素。但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直接威胁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石油安全,因而招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讨伐,最终被迫承认1963年划定的伊科边界。当时科、伊两国已探明石油储量

¹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④ 同上书。

^④ 王丰、刘洪义、李建华著:《石油资源战》,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1/4} 参见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页。

^{1/2} 参见同上书。

^{3/4} 参见[埃及]安瓦尔·萨达特著:钟艾译:《萨达特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49页。

约占世界总储藏量的 20%，产量占石油输出国组织总产量的 21%。¹ 而美国石油进口量的 1/4 来自海湾，西欧、日本也分别有 50% 和 70% 的石油来自海湾地区，海湾石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生命源泉。^④ 美国国务卿贝克称，美国出兵海湾旨在防止伊拉克控制该地区石油资源。^④

约以关系也受到了石油安全因素的影响。尽管中东素有“世界第一油库”之称，但石油并没有青睐每一个中东国家，很多国家均缺少石油资源。以色列便是一个典型的“贫油国”。长期以来，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迫使以色列不得不主要从伊朗、俄罗斯等国进口石油。然而，以色列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并不稳定，从而增加了石油供应安全的变数。因此，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政府都念念不忘重新启用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石油管道。^④ 这条石油管道是英国殖民者于 20 世纪 30 年代修建的，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后便被废弃。该管道的重新打通可以使以色列获得丰富的伊拉克石油，这将有助于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并提高石油供应安全系数。鉴于此，以色列建国后，一直积极致力于约以和平的实现。1994 年，以色列终于得偿所愿，约以和平的实现为以色列实现石油的梦想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水资源来看，水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资源。所谓水资源安全，是指人类社会在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无视水资源的有限性，不顾水环境的承载力，过度开发与非科学地使用、消费和挤占生态用水，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环境的破坏，引起水资源匮乏、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进而威胁到人类健康、工农业生产、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⑤ 在中东，水被称为“流动的生命”、“蓝色的金子”，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像中东那样，水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⑥ 确切地说，中东除土耳其、苏丹和黎巴嫩三国外，其他国家均面临水短缺问题。^⑧ 对于中东各国来讲，水资源安全已成为国家制定内外政策时必须认真加以考量的一大因素。水资源安全是影响该地区国际关系的重大因素之一，水资源需要以一定的领土为依托。因此，围绕水资源而产生的各种纠纷便与边界领土争端息息相关。“水可能是决定人与土地关系的一种最重要的物力资源”^④，而“没有实现对水的控制的对土地的控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⑤ 事实上，关于水资源的领水争端也是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类型。

在中东边界领土纠纷中，阿以争端最尖锐和复杂，与水相关的问题尽管不是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形成敌对关系的唯一因素，但水问题却被双方视为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情，所以，在有关约旦河水问题的争端上，双方都不准备让步。^⑩ “该地区（指中东）水争夺最激烈的流域就是约旦河流域。”^⑪ 以色列、约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均处于一种“慢性水枯竭”状态。^⑫ 尤其对以色列和约旦而言，约旦河及其支流是基本的地表水源，满足着以色列约 1/3 的水需求和约旦约 3/4 的水需求。^⑬ 正如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在 1948 年曾指出：“以色列土地上最重要的河流是约旦河及

¹ 彭树智主编：前引书，第 433~434 页。

^④ 同上书，第 433 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 434 页。

^④ 参见王丰、刘洪义、李建华著：前引书，第 183 页。

^⑤ 参见陆忠伟主编：前引书，第 219 页。

^⑥ 世界银行中东地区副总裁凯奥·科克-韦瑟语。见彼得·坎普（Peter Kemp），载英国《中东经济文摘》周刊，1996 年 1 月 26 日一期暨总第 40 卷第 4 期。转引自朱和海著：《中东，为水而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2 页。

^⑧ 参见朱和海著：前引书，第 36 页。

^④ 转引自朱和海著：前引书，第 22 页。

^⑤ 同上书。

^⑩ 参见 [美国] 迈克尔·T·克莱尔著：董新耕、之也译：前引书，第 175 页。

^⑪ 转引自朱和海著：前引书，第 251 页。

^⑫ See Jan Selby, *Water,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Other Israeli - Palestinian Conflic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3, p. 22.

^⑬ 朱和海著：前引书，第 251 页。

(其支流)耶尔穆克河。”¹ 以色列政府历来把“水安全问题”置于与国防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④ 因此,从以色列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时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夺约旦河流域水权利的矛盾便开始日益激化,^④ “约旦河流域便一直是无数冲突发生之地”^④,围绕约旦河水的争端便一直是阿—以关系的一个常见特征。

第三次阿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约旦河水之争引发的,^⑤ 这次战争使以色列的水安全问题得到了重大改善。通过占领戈兰高地,以色列得以控制巴尼亚斯河,从而消除了对约旦河源头的任何威胁。同时,通过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还获得了约旦河下游的控制权,并获得了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山区的地下蓄水层。1982年爆发的第五次阿以战争使以色列轻易控制了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水资源——利塔尼河水,从而进一步缓解了以色列的水安全问题,增强了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优势。毋庸置疑,阿以争端的实质是土地问题,而隐藏在土地问题背后的是水。以色列长期占领阿拉伯国家大片领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占有那里的水资源。水资源问题一直是以色列拒不完全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主要原因。而以色列之所以紧紧抓住戈兰高地不放,原因就是需要水,对以色列而言,它就是水库。^⑥ 在许多以色列政策制定者看来,利塔尼河供水有望解决他们国家迫在眉睫的水危机。^⑥ 因此,1991年5月11日,以色列正式宣布,在它自己的“那份”利塔尼河水未得到确认之前,它将不从黎巴嫩南部撤军。^④ 而这些水资源对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约旦、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安全来讲,同样具有重要性。可见,阿以冲突中的水资源安全因素尤为明显。此外,由于中东国家普遍面临水短缺问题,加之,许多水源都来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声称有主权地区或落在没有既定边界线存在又无明显特征的边境地区,因而水资源安全因素也存在于中东其他边界领土争端中,如两伊间的阿拉伯河争端等。

经济安全

所谓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处于不受来自国内外诸种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威胁、虽受威胁但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状态;一国的经济安全程度由该国经济预防、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和可能受到的威胁决定。^④ 事实上,资源安全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二者密切相关。因此,这里的经济安全主要关注国家出海通道的安全。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社会,而海上运输通道是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线路,尤其对于那些严重依赖海上运输而又缺少出海口的国家来讲,出海通道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出海通道安全是影响中东某些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伊领土争端和伊科领土争端就与确保国家出海通道安全直接相关。

伊朗与伊拉克在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上的争端是双方领土争端的焦点,这是由阿拉伯河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决定的。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合而成,全长约204公里,其中从巴士拉以南约30公里的卡拉玛——海湾入海口约105公里的一段河流是两伊的界河。阿拉伯河虽

¹ Marq de Villiers, *Water Wars: Is the World's Water Running Ou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9, pp. 220-221.

^④ See *ibid*.

^④ 参见朱和海著:前引书,第257页。

^④ Peter Beaumont, "Conflict, Coexistence and Cooperation: A Study of Water Use in the Jordan Basin", in Hussein A. Amery and Aaron T. Wolf, *Water in the Middle East: A Geography of Pe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0, p. 22.

^⑤ See Bulloch, John and Adel Dawish, *Water Wars: Coning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93, p. 34.

^⑥ 参见[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993年11月5日。

^⑥ 参见朱和海著:前引书,第368页。

^④ 转引自朱和海著:前引书,第370页。

^④ 参见熊明峰:《论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载《欧洲》,1997年第6期,第20页。

短,但对两国经济而言,可称得上是一条黄金水道,是两伊的命根子。¹ 伊拉克无直接出海口,阿拉伯河连接伊拉克在海湾北端的法奥港是伊拉克通过海湾向世界出口石油的唯一海上通道。距阿拉伯河口约 120 公里处的巴士拉是伊拉克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巴士拉北部的马基勒是伊拉克最大的海港,伊拉克主要的原油输出管线常常紧贴阿拉伯河岸铺设。地理条件决定在相当长时期内,阿拉伯河为伊拉克的主要经济命脉。因此,伊拉克认为对阿拉伯河独占的不受侵犯的主权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历届伊拉克政府,无论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都主张对整条阿拉伯河拥有主权。^④ 阿拉伯河对于伊朗也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尽管伊朗有漫长的海岸线,但阿拉伯河也是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在阿拉伯河畔的霍拉姆沙赫尔数十年来一直是伊朗最重要的港口,也是横贯伊朗铁路系统的起点站。同时,阿拉伯河两岸也是重要的石油产地。东岸伊朗的胡齐斯坦省是该国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91% 和 93%。同时该省也是伊朗主要的粮食产地。西岸是伊拉克的石油中心巴士拉省,这里有伊拉克的鲁迈拉大油田。而且,两伊都十分依赖石油出口。石油是两伊外贸出口的主要物资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阿拉伯河对于保障两伊的出海通道安全以至经济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两伊领土争端相同,保障出海通道安全也是伊拉克与科威特领土争端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20 世纪 60、70、90 年代分别发生的 3 次重大伊科领土危机都是在伊拉克唯一的出海通道阿拉伯河的通航安全遭受威胁、伊拉克被迫另辟一条出海通道的背景下发生的。^⑤ 如上所述,两伊长期存在阿拉伯河边界纠纷,当纠纷达到白热化时,阿拉伯河通航安全便难以保障,伊拉克物资流通尤其是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制约。尽管伊拉克在海湾地区有 80 多公里海岸线,但因沼泽阻隔和沙滩水浅而无法建港。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为了另辟一条出海通道,开始在靠近科威特边界相对适宜建港的祖拜尔湾修建乌姆卡斯尔港。但由于从祖拜尔湾到海湾宽阔水域须穿经紧靠科威特布比延岛和沃尔巴岛的几十公里长的阿卜杜拉湾狭长水道,伊拉克为确保未来出海通道的安全,不断向科威特提出对布比延岛和沃尔巴岛的领土要求,乃至最终走上武力吞并科威特之路。

恐怖主义

一般意义上来说,恐怖主义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所谓恐怖主义,就是指试图以制造或威胁制造暴力的方式,有系统、有计划地针对敌对方的不设防或难以设防目标(包括平民、标志性建筑和名人等),积极利用公众舆论效应,以使敌对方民众产生恐怖心理,迫使敌对方政府作出妥协或让步,最终实现自身公共目标的思想、逻辑和行动。^④ 主体上,恐怖主义主要是由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但也存在由主权国家从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现象。恐怖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为跨国性与社会性。恐怖主义古已有之,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尤其是巴以冲突便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早在以色列建国前,为争夺土地等有限资源,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针对彼此的恐怖活动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以色列建国后,双方间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对于犹太人来讲,拥有以色列国家的政治主权,并不等于拥有大部分土地的产权。而作为西方“民主”文化培植下的以色列,在不能用赤裸裸的军事手段直接剥夺阿拉伯人土地的情况下,用恐吓、屠杀和驱逐的方法迫使阿拉伯人“自愿”或非自愿地“抛弃”其土地就成为唯一可行的措施。从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

¹ 参见江红著:《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的历史透视》,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④ 参见赵伟明:《两伊冲突的由来与发展》,载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⑤ 参见杨光:《伊拉克科威特领土争端透视》,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2期,第48页。

^④ 参见张家栋著:《恐怖主义论》,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页。

年)到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一些犹太武装对阿拉伯平民采取了“清洗战术”¹。这种战术很快便取得了重大成功:到1949年夏末,仅仅根据美国和联合国外交人员的记录,就有大约40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④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为巩固胜利果实,除了由军队直接从事暴力活动外,以色列政府继续怂恿、支持犹太极端组织。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已经成功地达到了驱逐阿拉伯人的目标。不过,犹太恐怖主义仍然以国家行为的方式继续存在。由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不断逃向周边阿拉伯国家,并以这些国家为反以基地,以色列的报复行为便带有国际冲突的色彩。加之,伴随以色列侵占的阿拉伯国家领土范围的不断扩大,以色列将这种恐怖活动也带到了新占领的领土上。因此,巴以间的恐怖活动逐渐扩展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阿以冲突。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讲,阿以战争的屡屡战败使他们逐渐倾向于非常规斗争方式,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又为这些暴力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及其随后埃以历史性和解,使巴勒斯坦人靠常规武力实现目标的愿望彻底破灭。非常规的、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斗争方式逐渐增多。与此同时,鉴于在以色列领土发动武装袭击日益困难,一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直接袭击以色列人转变到打击以色列及其主要盟国美国的海外利益,导致巴以冲突进一步国际化,从而增大了巴以以及阿以冲突的复杂性。

可见,以色列建国前,阿犹间发生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尤其是犹太恐怖主义成为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百年噩梦,成为巴以间仇恨、冲突的重要根源。以色列建国后,犹太恐怖主义的成功对阿拉伯恐怖主义又起到了恶劣的示范作用,双方继续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伴随这种恐怖打击范围和巴勒斯坦人反以基地范围的不断扩大,亲以国家特别是美国,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如黎巴嫩和约旦愈益密切地被卷入巴以冲突,从而使巴以冲突更加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巴以双方内部在关于究竟采取何种斗争方式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均同时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激进组织与温和组织,因而导致巴以冲突乃至整个阿以冲突极大地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巴勒斯坦内部在对以色列采取恐怖打击问题上的分歧,常常造成巴勒斯坦内部的混乱和斗争,结果大大削弱了巴勒斯坦自身力量,使其成为一个无法与以色列进行正常谈判的弱势政府。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勒斯坦一些极端组织针对以色列人进行的恐怖活动,被以色列认为是巴勒斯坦当局软弱无力的结果,这成为以色列继续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保持军事力量和采取军事行动,以及推迟和谈进程的一个口实。^④

事实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并无绝对界限,两者往往彼此交织,且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然而,无论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是指一种安全观念。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认为,正是观念赋予物质性因素以意义,涌动于国际关系深层的因素是文化(共有知识或观念),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物质性权力和制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谓国际体系就是“观念的分配”^{1/4}。在国际政治中,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物质,而是它被表现出来的方式。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行进。”^{1/2}因此,

¹ 参见张家栋著:前引书,第136页。

^④ 同上书,第136~137页。

^④ See Ioannis A. Stivachti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Non-Offensive Defence in the Zone of War: the Greek-Turkish and the Arab-Israeli Cas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p. 115

^{1/4} 宋秀琚著:《国际合作理论:批判与建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1/2} From Max Webe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80. 转引自【美国】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尽管国家对外政策及在其指导下的国际行为最终都是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但从安全的视角讲,中东国家在安全观念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边界领土争端的解决。在全球化与地区化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愈益交织的新形势下,任何国家要想获得安全,必须抛弃传统的片面追求绝对安全的观念,而应树立能够充分反映安全内容的综合性、安全关系的依赖性,以及安全手段合作性的新型安全观念。

然而,安全又不仅是一种主观感觉,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仅有观念的转变还不够,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安全机制作保障。所谓国际机制是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¹而所谓国际安全机制就是指在安全问题领域发展起来的国际机制。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国际机制有助于减少国家间相互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安全困境中的恐惧与欺骗,降低交易成本,培育信任与合作精神。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做出相应的增加。^④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的强势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其他国家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④但是,目前中东地区盛行的仍是以传统安全观念为指导的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如以色列与土耳其双边军事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安全机制均是具有排他性、对抗性的传统安全机制,只会进一步强化同盟外国家的不安全感和对抗意识,不符合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鉴于此,建立以新的合作安全理念为指导、以多边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地区多边合作安全机制便成为中东国家面临的一项迫切战略任务。具体来讲,考虑到中东地区的极其复杂性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性,这种地区安全机制应具有以下特征:(1)软机制性。应着重创建以灵活务实和协商对话为特征的软性机制,而尽力摒弃以强制性和约束性为特征的硬性机制。(2)渐进性。应遵循对话方式由批评性对话到建设性对话,对话内容由软安全问题到硬安全问题,合作内容由有限合作到全面合作,空间上由次地区合作到地区合作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④(3)互动性。应加强地区内新的安全组织与传统安全组织、地区间安全组织,以及安全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互动。(4)合作性。应注重通过以合作为主导的方式来实现和确保国家与地区安全。(5)开放性。新地区安全机制应对本地区所有国家乃至区外国家开放,同时要重视非政府行为主体的重要性。总之,鉴于安全既是一种主观感觉,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二元性特征,解决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国家安全观念的转变,也有赖于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的确立。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参见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④ 参见李学保著:《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与争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④ See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6.

^④ See Majid Tehranian, *Bridging A Gulf: Peacebuilding in We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Publishers, 2003, pp. 236-237.

Civi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African Democratization

Chen Yao

pp. 33– 37

It is generally though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at civil society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globally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in late 20th 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using the norm expression of civil society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s, progress and characters of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However, positive studies show that African civil society has acted limitedly in African democratization and

disappointedly in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African democracy, though they have been developing so fast. The reason of being so is that African civil societies are not mature and showing their vulnerabilities of lacking integrity, slow growth, weak strength and poor capacity of adaptation. These vulnerabilities determine that it is a long term for African civil societies to attain their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A General Assessment 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Yao Guimei

pp. 48– 54

Th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improving their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have become a major investor with no exception, joined investing in Africa. Mos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ed in Africa have achieved win-win results, not only relieving the issues of Chinese domestic resource shortage and driving the exports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products, but leveling up Africa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having contributed to increasing African taxes and improving

employment. However,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fac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re taking measures to enforce their management capacity so tha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could go along the road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While the current global crisis brings about risks to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t presents opportunit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stand on long-term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 their investment in Africa.

On the Disputes about Territories and Boundaries among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acts (2 of 2)

Xie Lichen & Huang Minxing

pp. 61– 67

From the angl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e territorial and border disputes betwee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resource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and terrorism. The key oil and water usually source from or reserve in the areas of disputed borders and offshore economic zones of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which makes the border disputes mixed with resource conflicts and contention for vital economic passages. Terrorism

has not only intensified the hates betwee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complicated the border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ized them, but has frequently been undermining solving these issues peacefully. From the security perspective, solution of the Middle East territorial and border disputes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ir conversion of nation security concep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